



# 中日军队在上高会战中的战略战术博弈

贺怀锴 安琪

**摘要:**1941年的“上高会战”是日军首先发动的以打击国民政府第十九集团军作战能力、掠夺物资为目标的扫荡战,但日本在战略上摇摆不定、处于自我矛盾之中,在战术、军事行动上,各部亦未能有效配合,最终陷入国军的包围,损失惨重。而战前国民政府对于日军可能要南进的战略有较为准确的认识,同时第九战区对于日军进攻上高、高安地区的可能性也有高度警惕与清醒的判断,并做过一系列战前准备。战时各阶段国军将领指挥得当,能够掌握主动权,军队多能按作战计划完成既定任务。在国民政府的恰当布置下,这场反扫荡战演变为颇为成功的围歼战,上高大捷被誉为“开战以来最有精采之作战”。总之,上高会战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型战役的代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型战役;1941年上高会战;中日军队;战略战术博弈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718

**收稿日期:**2023-07-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省制变革与社会变迁研究”(20&ZD232)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民政府海疆治理研究”(22CZS07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贺怀锴,男,河南台前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心副教授、博雅拔尖人才,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军事史,E-mail: hehuaikai1990@163.com;  
安琪,男,河南漯河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高会战”(日方称“锦江作战”)发生在赣西北的上高、高安地区,自1941年3月中旬开始至4月上旬结束,历时20余日。此役国军重创日军,取得上高大捷。上高会战是国民党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一场颇为难得的胜仗,但学界给予的关注却不足。目前关于上高会战的研究主要在抗日战争通史类的著作中有所提及,相关论文则侧重于战争过程的概述和胜利原因的探讨<sup>①</sup>,而忽视了对战役前的中日战略动向、战前备战、战役中的战术较量等方面的关注。就国民党正面战场而言,学界一般较多关注大型会战,而对相持阶段的中型战役关注较少。而相持阶段的中型战役是抗日战争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宏观的战略局势紧密关联,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从中亦可透视出国军在中型战役中的战前判断、战略战术等内容,对这些相持阶段的中型战役进行系统研究很有必要。上高会战即为其中的一例。本文以上高会战为例,依托中日双方档案、资料集、报刊、日记等史料,力图突破以往仅简单阐释战役基本经过的研究模式,通过多元史料的对比印证,对这一战役的战前情形、战中战术、战后宣传等方面进行系统的阐述与考证,以丰富抗日战争中型战役的研究。

## 一 战前日军的战略动向与战役目的

南昌为水路交通要道,同时也是国民政府的航空基地,威胁着日军占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鉴于南昌战略位

<sup>①</sup>谈及上高会战的相关著作有: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6—229页;张宪文、陈谦平、陈红民《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1—862页;等等。上高会战的论文成果则有:廖信春《上高会战胜利原因简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第62—66页;戴佳臻《一九四一年的上高会战》,《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第57—59页;邹耕生《上高会战述评》,《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12期,第73—77页;隆鸿吴《对上高会战细节的几点考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6—9页;等等。

置之重要,1939年3月上旬,日军发起南昌战役,并于27日占领南昌<sup>①</sup>。4月至5月,国民政府对南昌展开了反攻战。5月5日,白崇禧致电蒋介石称,国军“已尽甚大之努力”而未能攻下南昌,遂主张“重新拟定计划”<sup>②</sup>,在赣西地区予敌打击。蒋介石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于5月9日下令终止南昌反击。国军在南昌的军事行动,证明国军在江西尚具实力,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罗卓英任司令的国军第十九集团军所驻扎的上高、高安一带,处于抗击日军正面战场的前线,是长沙的东方屏障,战略位置颇为重要,因此罗卓英部对日军可能发起的攻势有所预判。然而,就整体宏观的战略态势而言,国民政府虽对此地区可能爆发的战争有着高度的警惕,但属于被动应对的一方,战争发起的主动权仍掌握在日方手中。

### (一)战前日军的战略动向

在武汉会战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作战阶段。其一,在军事战斗上,此后日军虽发起了随枣战役、第一次长沙战役、桂南战役、枣宜战役等进攻,但未取得显著战果,冈村宁次在1940年3月时就承认,日军行动未能摧毁中方的“抗战企图”<sup>③</sup>。伴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守备兵力的增加,日军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日益突显,发起大规模会战愈发困难,以有限的兵力“迅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了”。其二,在政治诱降上,1940年初,日本启动了诱和蒋介石的“桐计划”(日方表述为“桐工作”)。重庆国民政府最初对此寄予期望,但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尤其是百团大战的胜利,中国人的抗战信心倍增,时人普遍认为中国还有很强的力量,没必要谋求屈服性和平。基于这一抗战形势,国民政府不得不决定“暂行搁置”议和计划;日本驻港武官铃木卓尔在给“桐工作”负责人今井武夫报告中,亦指出谈判“没有迅速进展的希望”<sup>④</sup>,日方随后决定暂时中止“桐工作”。随着“桐工作”的停顿,日本方面对类似的直接工作,一齐调整为静观的态势,停止采取积极措施<sup>⑤</sup>。鉴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政治诱降国民政府的两条路线均告无望,日方对解决“中国事变”的态度逐渐趋向消极。1940年11月,日本大本营下发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便称,至1940年底,与重庆政权仍不能实现和平,则不论形势如何,断然向长期战方转移<sup>⑥</sup>。日本在中国战事未结束之时又欲谋划南进<sup>⑦</sup>,其在中国战场转入较为保守消极的长期持久战已势在必行。同时,这也意味着日本将要削减在华兵力,甚至放弃原有的一些占领区,这引起了日本高层的激烈争论,天皇也颇为不满<sup>⑧</sup>。日本高层的摇摆不定,导致原先决定的长期战体制被推后。

此时,日本陷入了转入长期战体制的现实需求与不甘轻易放弃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矛盾之中,并在1941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所制定的《对华作战长期指导计划》中得到充分体现。该文件规定,“作战以维持治安与占领地区的肃正为主要目的,不进行大规模作战,必要时在短时间内,实行近距离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地区,返回原驻地为原则”<sup>⑨</sup>,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日军参谋本部对华作战的消极态度。但令人感到矛盾的是,此指导计划依然坚持“准备在昭和16年(1941)夏秋时期,发挥综合战力,给敌人以重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事变”,即1941年“秋季以前不放松对中国的压迫,在夏秋时期以积极作战力求解决中国事变”,虽称之为《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而1941年秋以前“不包括在长期作战计划范围以内,依然要继续进行决战”<sup>⑩</sup>,说明此时日军依然没有放弃通过积极作战的方式以寻求事变的解决。但这种所谓“积极作战”是仅就1941年秋季之前而言,所谓“事变解

①「第2南昌攻略戦」,「第11軍作戦経過の概要並に所見 昭和13年」,17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C11112057900。

②《白崇禧电蒋中正南昌逾限未能攻下请予宽宥重定计画》(1939年5月5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一阶段作战经过,档号:002-020300-00012-064。

③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5页。

④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今井武夫回忆录》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36、178、178页。

⑤「22今後ニ於ケル対重慶工作处理要領」,629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C12120068700。

⑥「2、支那事变处理要綱 昭和15年11月13日」,264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C12120206600。

⑦「世界情勢の推移に伴ふ時局处理要綱 昭和15年7月27日」,925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C12120200800。

⑧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田琪之、齐福霖译,宋绍柏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页。

⑨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2卷中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3种,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0页。

⑩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01、102页。

决”即指使国民政府屈服日本,这在日军对华作战逐渐消极、开始谋划南进之际是难以实现的。指导计划中多次描述通过外交施压、经济封锁等综合手段欲使国民政府屈服,所谓1941年秋季之前的积极作战并不是大举西进,而是日军不甘心立刻转入长期作战体制,轻易缩减在华兵力,而对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带有尝试性的行动。对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就曾提出看法,认为“迄昭和十六年末之前解决中日战争一事谈何容易,虽不惜努力一试,但并无确信”,甚至直言“此案只能当做努力之目标即可,但,如果要切实付诸实行,则不合乎实情”<sup>①</sup>。时任陆军次官的阿南惟几在相关会议上,也对积极解决中国事变表示忧虑<sup>②</sup>。

在宏观指导计划之下,1941年2月14日,中国派遣军召集各方面军和各军的司令官在南京召开会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在会上指出,“今年最重要的任务是全军一致竭尽全力粉碎敌人的战力,并在占据地区确立治安,配合其他各项措施,取得显著的成绩。战略指导的要点在于,在以治安为主的地区更加彻底地确保治安;在优势的敌人正规军聚集的地区,不断地积极地进行作战,摧毁及消耗敌人的抗战力”。这表明了中国派遣军在1941年的宏观战略方针,一是在占领区(华北为主)进行更加彻底地确保治安,即后称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二是在正面战场进行积极作战以消耗国民政府的抵抗能力,但其中又特别强调了所谓的“灵活、短距离截断作战”这种消极的作战方式。而司令部设于汉口,主要负责湖北、湖南、江西方面作战的日军第十一军,2月23日召开兵团长会议,下达新年度作战计划,其中称“军的任务与总军毫无差异,各兵团要积极不断地依靠灵活、短距离截断进攻作战消耗敌之战斗力量和确保压倒敌人的地位”<sup>③</sup>。按既定的双重规划,于是便有了上高战役。

由于要进行华北治安战,华北兵力不足,日本之中国派遣军决定抽调驻守在安义地区的第三十三师团到华北<sup>④</sup>。因为日军要通过积极作战来消耗国民政府的抵抗能力,在日军第三十三师团调走前,日方欲凭借较多的兵力,进行一场以打击中方第十九集团军为目的的联合作战。只有把上高会战放置于这样宏观的战略之下,我们对于上高会战的发生及其背景才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 (二)日军的战役目的

上高会战始于驻守安义地区的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准备调往华北之前,日军准备集结第三十三师团、第三十四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对上高地区驻扎的国军第十九集团军进行一次作战。日本发动锦江作战的战役目的,是将国民政府第十九集团军第七十军和第七十四军的战力摧毁<sup>⑤</sup>。据国民政府截获的日军文件记载,日军以第三十三师团为右翼、第三十四师团为中路和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为左翼,三路直指上高地区,“企图预定窜陷上高后,即行撤退”<sup>⑥</sup>。但事实上,日军两个师团的作战目的并不统一,相互之间的配合问题重重。

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师团调走前有予敌一击的惯例,第三十三师团调走也是如此,但这个所谓“给敌一击”在不同兵团中有着不同的理解。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比较消极,其作战计划称,“师团与第三十四师团相策应,从左侧攻击第七〇军,将其压制在锦江”<sup>⑦</sup>。显然,第三十三师团未准备作为主力进攻,作战时亦未彻底完成压制第七十军的目的,仅是攻占部分地区,并与第七十军进行一些战斗,便自以为完成了作战计划而开始回撤,整个过程未见其与第三十四师团有太多协调。从后来第三十三师团在国军围歼日军时迅速回援和之后参加了中条山战役的情况来看,其损失并不算特别大。之所以回撤,是因为其未将占领上高作为作战目的,未做好攻坚作战的准备。从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四联队矢野大队长给其部下下达“士兵备五天一餐口粮,马带粮秣三天”的命令<sup>⑧</sup>,可看出其准

①《初期陆军作战(三)欧战爆发前后之对华和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三,廖运潘译,“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年版,第449、450页。

②「昭和16年1月 機密戦争日誌(1)」、240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C12120317500。

③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04、124页。

④「第5章 昭和16年に於ける作戦」、1393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C11111991700。

⑤「锦江作戦 自昭和16年3月15日至昭和16年4月2日」、527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C11110446600。

⑥「贺耀组呈蒋中正上高会战经过概况」(1941年4月4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二阶段作战经过,档号:002-020300-00013-061。

⑦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25页。

⑧黄宣成《胜利的回忆,会战的演成》,全国政协《闽浙赣抗战》编写组编《闽浙赣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备动员并不充分,作战方针比较消极。

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却十分积极。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在日记中写道,“总军虽有些悲观,但仍稳健。南昌驻军则在作战上信心很足”<sup>①</sup>。总军即中国派遣军,南昌驻军即第三十四师团。与第三十三师团比较消极,只想在调走前予敌一击不同,第三十四师团“从头开始就有趁此机会摧毁第一九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上高的企图”<sup>②</sup>。第三十四师团积极备战,“自2月中旬就开始紧急装备野炮兵联队,并把缴获的山炮及迫击炮改为马驮进行训练,还大量征用中国民伕积极进行作战准备”<sup>③</sup>。第三十四师团虽有明确的战役目的,但在国军看来却造成了诸多失误,“对我军力量估计过低”,犯了“轻敌”之错,加之以往所进行的扫荡战胜利结果而产生的“骄妄”行动,又犯了“忽敌”之错<sup>④</sup>。这注定了其失败的结果。

尽管统一在“消耗敌之战斗力量和确保压倒敌人的地位”这一战略目标之下,但两个师团的作战意图不统一,加上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一共三个兵团并立作战,第十一军竟没有特别为此设置司令部战斗指挥所,而是由平时的汉口军司令部进行指导。据中途接任汉口军司令部参谋长的木下少将说,“在军的根本计画中,对并立作战的师团未给予直接指导,只指示了攻击目标及作战期间,令各师团各自实施作战,这种作战计画简直是在胡闹”<sup>⑤</sup>。这导致第三十三师团与第三十四师团之间难以配合作战,担任主攻的第三十四师团十分积极,以覆灭第十九集团军所在地的上高为战役目的;而第三十三师团作战目标比较消极,仅仅是简单策应第三十四师团,完成调走前与敌一击的战役目的。这种矛盾感的背后是侵华日军日渐困难的处境。2月23日召开的日军第十一军兵团长会议,就指出,“军正处在这样的困难局面:在第一线要豁出战力的消耗,另一方面又很难恢复和增强国防力量”<sup>⑥</sup>。究其根本,是日本军国主义无限膨胀的野心与欲望和其有限的国力之间的矛盾。

上高战役的发动与日本宏观战略态势是紧密相连的。1941年初,日军宏观战略目的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由于南进的需要以及解决“中国事变”尚没有进展,故而要转向长期战体制,并削减在中国的兵力;另一方面,日方内部很多人不满在华削减兵力,因而将转向长期战体制的时间推后,想在1941年通过积极作战与经济、外交配合以迅速解决“中国事变”。这种矛盾亦反映在直接在华作战的中国派遣军身上:一方面称要在昭和16年(1941)努力解决“中国事变”,另一方面却高唱“短距离截断作战”这种较为消极的作战方针。这种矛盾又体现在具体的上高会战中。上高会战虽为日军主动发动之战役,却在会战开始前充斥着各种矛盾,这些矛盾实际上就是日军宏观战略矛盾的具象化。

## 二 国民政府的战略判断与战前准备

国民政府对日军的战略转向以及在江西发起的上高战役目的有着较为准确的预判。罗卓英指出,日军发起上高会战是“企图一举攻略上高,打击我之军力,窜扰清江樟树,夺我之物资”,进而达到“巩固南昌”的目的,最终达成其“抽兵”至其他地区的阴谋<sup>⑦</sup>。负责上高地区的第九战区,在侦知日军企图的情况下,提前做了准备,最终赢得了上高战役的胜利。

### (一) 国民政府的战略判断

武汉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军政要人就中国战场的未来走向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李宗仁指出,武汉会战后,“敌人因深入我内地,战区扩大,补给线延长,兵力不敷分配,也有陷入泥淖之势。故无力对我作全面进攻,只有对各战区不时作间歇性的战斗”<sup>⑧</sup>。这一预判基本符合事实。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就寄希望于国际干涉,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更在思考如何使中日战争国际化。他在日记中写道,“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25页。

②《初期陆军作战(三)欧战爆发前后之对华和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三,第487页。

③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25页。

④《罗卓英电蒋中正自十五日敌进犯至二十八日我开始追击两周间上高会战概要》(1941年3月30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四十五),档号:002-090200-00069-140。

⑤《初期陆军作战(三)欧战爆发前后之对华和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三,第493页。

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24页。

⑦《罗卓英电蒋中正第十九集团军上高会战情形》(1941年4月10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四十三),档号:002-090200-00067-014。

⑧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534页。

意与各国干涉”<sup>①</sup>。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后,蒋介石立刻提出一项战略性的谋划,即注意“如何使中倭战争牵入于欧战范围之内,使与欧战共同解决”<sup>②</sup>。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意味着日本与英美处于敌对状态,暴露了日本对太平洋的野心。此时日军战略动向的转变已经纳入国民政府的考量之中。

对于日军1941年的宏观战略动向,国民政府预判日军有南进企图,意味着日军向西继续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降低。1941年2月24日,蒋介石指出,“若以倭目前对泰越与海南岛之动作而论,美倭势非决战不可”<sup>③</sup>。2月27日,时任第六战区司令的陈诚上书蒋介石称,日本“与德意春季攻势配合,实行南进,公算甚大”<sup>④</sup>。而对于日军南进与中国战场的关系,时人指出,“在日人南进中,中国的抗战始终是最强劲的阻力。日人企图‘冻结’‘中国事变’,以便其遂行南侵,结果将必失败。中国抗战,非把日人的侵略野心消灭,非完全达到抗战之目的,决不停止,中国的抵抗一天继续下去,则‘中国事变’一天不能‘冻结’”<sup>⑤</sup>。“中国事变”为日军南进最大阻力,若要南进则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动向必有转变。第十九集团军总部参谋处在上高会战后所编的《上高会战概述》中总结道,“倭阀西进大陆政策的迷梦,经我四年来之抗战打击,已深陷泥淖,无力自拔,乃企图混水摸鱼,乘英、美有事欧西之秋,发动南进,窃取资源。但欲发动南进,以先天不足的倭国,决难再由国内扩兵,是必由西进中抽兵,以行转用。去冬南宁的退出,即其明证。其余各战场为遂行其部份的抽兵,并为巩固其既占的城镇,乃以先发制人之阴谋,对我各战场实施其所谓扫荡战”<sup>⑥</sup>。

## (二)战前国民政府的准备与决策

赣北地区作为前线,国民政府对日军进攻的可能性有着较高的警惕。直接指挥上高会战的罗卓英称,“我军在赣北方面之作战指导,对于敌人来犯,早经策定反击计划”<sup>⑦</sup>。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称,“依据本部廿九年四月颁布之反击作战计划,敌如向高安、万载进犯时,则诱敌于分宜、上高、宜丰一带地区反击而歼灭之”<sup>⑧</sup>。可见,第九战区对于日军的进攻早有准备。处于一线的战情预判,足以让国民政府对日军的大举进犯提高警惕。

在上高会战前夕,国民政府对于日军的进攻已经有所预判。其一,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积极备战,大量征用中国民夫。日方认为,“征用民夫一事会很快传到重庆军那边,而使其加强防备,这也是中国战场上的常事”<sup>⑨</sup>。其二,国军侦知日军转运兵力。早在1941年3月3日,罗卓英致徐永昌等的电报中,便通过对日军在南昌、安义的增兵,以及日军飞机对赣江西岸国军阵地的侦察,判断“敌似有进扰企图”<sup>⑩</sup>。为了迷惑国军,日军在“南浔铁路北上火车,每一车厢的窗口均露出人枪。南下火车,则车窗紧闭”,造成日军向北撤兵的假象。但第十九集团军参谋处通过坐探传来的各种消息综合判断,“北上露出人枪,系迷惑我军的假象,南下火车车身沉重,必满载部队与武器装备。判断南昌方面之敌,必有向我大规模进犯的企图”<sup>⑪</sup>。由此可见,在上高会战前,国军已经对日军的进攻企图有了较准确的判断。

同时,第九战区颇为重视士兵的整训,且取得了较好成效。其中,后来在上高会战中表现极为突出的第74军,参加了1940年的第三期整训,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士兵的作战能力<sup>⑫</sup>。上高会战中,第74军第51师补充团多为新兵,但在作战中,“当敌偷渡锦河时,亦能精确瞄准,沉着射击,将敌击退……卒能达成任务,且获步枪七枝”,

①《蒋介石日记》,1937年10月31日,本月反省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②《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4日。

③蔡盛琦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5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614—615页。

④陈诚《关于对敌作战与第六战区实况》(1941年2月27日),何智霖编辑《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下),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827页。

⑤《日本南进的步骤》,《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11月25日,第2版。

⑥《第十九集团军总部参谋处编上高会战概述》(1941年5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页。

⑦罗卓英《上高会战概述》,全国政协《闽浙赣抗战》编写组编《闽浙赣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224页。

⑧《薛岳关于上高会战战斗要报密电》(1941年4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348页。

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25页。

⑩《罗卓英致徐永昌等密电》(1941年3月3—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4页。

⑪蓝介愚《上高会战始末》,全国政协《闽浙赣抗战》编写组编《闽浙赣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257页。

⑫隆鸿昊《抗战时期第九战区的士兵训练》,《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2期,第119页。

“推原其故,实皆由于平日训练注意射击与战斗十三条之功也”<sup>①</sup>。日方也指出,第九战区军队的“整训收到显著效果,弹药等的补给也较充足,所以其战斗意志不可轻侮”<sup>②</sup>。从中可以看出,战前第九战区对士兵的训练颇有成效。罗卓英认为,上高会战验证了军队“战斗力之重要”,并提出以后“国军应特别注重训练与军队素质”<sup>③</sup>。

上高会战前,一个颇为重要的调整是第九战区与临近的第三战区进行了重新划分,将原来以赣江为分界线改为赣江东岸的部分地区划归第九战区,同时将原属第三战区的第49军划给第十九集团军指挥,增强了十九集团军的实力。在未进行战区调整前,罗卓英曾抱怨,“赣江东岸的部队,平时不归本集团督训,战时才拨归我指挥。各部队情况一切不明,打了败仗就要杀我的头”。十九集团军还致电军令部,请求重新划分战区界限,“南昌方面为一整体,赣江两岸的部队统一指挥后,无论攻防,均多便益”<sup>④</sup>。随后,军令部批准了这一战区调整的要求。罗卓英在总结上高会战经验教训时指出,“改划作战地域,得将赣江东岸部队尽量抽调应援,使态势变内线为外线”<sup>⑤</sup>。这也是上高会战胜利之重要原因。

### (三)国民政府战术的确立

基于国民政府对日军的战略预判以及对南昌方面日军可能发起对上高攻势的估计,第九战区薛岳和罗卓英制定了较为明确的战术,即初则“运用磁铁战术,逐次诱敌深入,予以消耗”,在南昌至上高间设置三道防御线,将日军诱至第三道防线前,继则“运用包围战术,实行长围封锁,加以歼灭”<sup>⑥</sup>。同时,在会战开始前的一两日(即1941年3月13日),第十九集团军策定的作战指导中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作战计划,“集团军为收复南昌,在此准备时期,第一线守备部队,应就现阵地尽力消耗敌人,敌进犯时则逐次抵抗,俟敌进入第三阵地线前,则以突击军及师之加入,与敌决战”<sup>⑦</sup>。虽然此作战指导称是为了收复南昌,但指导内容基本都是对于日军进攻的部署应对,收复南昌更多是一种政治军事上的表态。此作战指导策定于会战爆发前的一两日,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上高会战中国军队的作战指导方针。罗卓英在总结上高会战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大军作战,平时应策定详密之作战计划”,以此为“作战之准备”<sup>⑧</sup>。他认为,上高战役之所以能够取胜,原因之一在于有了完整的计划。

国民政府战前虽有准备,对日军进攻有所预判,但未料及日军发动作战之具体日期。3月15日,日军发动进攻时,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正在吉安,副司令刘膺古正在南岳,大事由参谋长罗为雄处理。在战争爆发之初,第十九集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的执行存在争议。3月17日,罗卓英返回上高后,第十九集团军对于敌情判断依然存在争论。其中,第十九集团副参谋长黄华国“判断敌人为扫荡战,待敌撤退时再予掩击,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力主撤退上高,不予决战”<sup>⑨</sup>;参谋长罗为雄也主张撤退上高。鉴于上高是第十九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且建有防御工事,以此固守堪称以逸待劳,且上高以西无阵地可守,日军若继续西进,则后果十分严重。罗卓英最终决定固守上高,原来存在于纸面上的反击作战计划,正式确立为上高会战的作战指导。尽管日军奉行短距离截断式作战,确实不以西进扩张占领区为目的,但事后国军再追击则难成围歼之势,此战可能仅会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次普通的拉锯战。罗卓英的决断,为上高会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可见临阵将领的指挥与决策也十分重要。

对于国民政府高层,战前的宏观判断更多体现在对日军南进的判断,而日军南进则意味着其对中国战场的战略动向有所转变。第九战区和第十九集团军则对南昌方面日军进攻之可能有着高度警惕,且颇为重视士兵的训

①《王耀武总结第七十四军上高会战经验教训的报告》(1941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355页。

②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20页。

③《罗卓英电蒋中正上高之战敌我伤亡及俘获及作战经验与心得》(1941年3月27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四十五),档号:002-090200-00069-137。

④蓝介愚《上高会战始末》,全国政协《闽浙赣抗战》编写组编《闽浙赣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255、256页。

⑤《罗卓英电蒋中正上高之战敌我伤亡及俘获及作战经验与心得》(1941年3月27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四十五),档号:002-090200-00069-137。

⑥《罗卓英电蒋中正第十九集团军上高会战情形》(1941年4月10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四十三),档号:002-090200-00067-014。

⑦第十九集团军《上高会战作战日记》(3月12日至4月9日),江西省上高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江西省上高县文化局编《抗日战争上高会战史料选编》下集,江西省上高县文化局2005年印行,第192页。

⑧《罗卓英电蒋中正上高之战敌我伤亡及俘获及作战经验与心得》(1941年3月27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四十五),档号:002-090200-00069-137。

⑨蓝介愚《上高会战始末》,全国政协《闽浙赣抗战》编写组编《闽浙赣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258—259页。

练,并为了更加灵活地应对进攻,在战前与第三战区进行了辖区与部队的调整,通过各种情报判断了日军的进攻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 三 中日军队在上高会战中的战术较量与战斗

上高会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3月15—19日,日本三路进攻与国军磁铁战诱敌阶段。此阶段,国军首先阻断日军南北两路,使其中路孤军深入,为合围中路奠定了基础。3月20—24日,日军中路突进上高与国军的包围战歼敌阶段。此阶段,日军中路孤军深入,陷入国军包围圈。3月25日至4月9日,国军围歼追击与日军的突围回撤阶段。此阶段,日军急令北路第三十三师团驰援被围的第三十四师团,在第三十三师团的支援下,第三十四师团脱离包围圈,但各部均损失惨重。

#### (一) 日军三路攻势与国军的磁铁战诱敌

日军按既定计划,以北路第三十三师团和南路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协同中路第三十四师团,兵锋直指上高,旨在摧毁国军在上高区域的主力部队。北路第三十三师团于3月15日由安义经奉新犯上富,并于19日“即行回窜”<sup>①</sup>;南路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于锦江南岸进军;中路第三十四师团由南昌西部之西山万寿宫出发,沿锦江北岸经高安,直指上高。

关于北线第三十三师团的撤退问题,中方与日方持有不同的观点。先看中方的观点。罗卓英指出,第三十三师团是日军合击上高的重要一部,即“北路与南路敌,先中路敌发动,其企图显然欲以两臂合抱之态势,先捕捉我军主力于高安、上高间地区而歼灭之”<sup>②</sup>。第三十三师团在发起攻势后,即遭遇了国军第七十军的阻击,在攻陷奉新、上富地区后便开始撤退。中方认为,第三十三师团是遭到国军的进攻后被迫撤退,是国军使其离心转进而不能合围上高的战术。蒋介石在发给各地方高级将领学习上高会战经验的电报中指出,“我七十军凭借潦河两侧高地,节节予敌打击。十八、十九两日,在甘坊、上富地区,向三十三师猛烈夹击,敌伤亡约两千五百余,我七十军亦伤亡甚重,卒将此路敌军击破”<sup>③</sup>。第十九集团军总部参谋处编写的《上高会战概述》记载,“北路残敌于十九日回窜时,复遭我尾击、截击,被歼大部”<sup>④</sup>。《中央日报》关于战役胜因的报道也称,“敌右翼被我李军首予以溃灭之打击”<sup>⑤</sup>。再看日方的观点。日方称第三十三师团将敌军击破,完成预定作战目标任务,于是恢复原态势<sup>⑥</sup>。中日双方无疑都对作战进行了有利于己方的历史书写。

事实上,日军各部作战意志不一,其作战目的是有所不同的。第三十三师团的作战任务并非占领上高,而中方第七十军的作战也并不顺利。从薛岳给前线的电报中可知,“七十军战斗初期作战不力,应予严办,希伤努力达成新任务,将功补过”,倘仍畏缩不前,贻误戎机,“定按军律议处”<sup>⑦</sup>。从第三十三师团后来回援被围日军来看,其作战能力未受太大打击,其撤退是因其作战目的比较消极,对中方第七十军进行一定的打击和占领部分地区后,便自认为完成了任务,并非蒋所说的“卒将此路敌军击破”。第三十三师团自认为完成的作战任务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甚至会起到反作用,“第三十三师团达到的作战目的,势必使重庆军攻击第三十四师团的右侧背”<sup>⑧</sup>。国军充分利用了日军的各路不协同的错误,大胆地由非决战正面抽兵,化内线为外线,化被动为主动,形成包围之势。

南路之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则遭到国军战力较强的第五十一师(属第七十四军)和由赣江东岸调来的第二十六师(属第四十九军)阻击,陷入苦战。日军的北路与南路均被国军阻击,陷入与国军对峙的泥潭,不能与中路合

①《贺耀组呈蒋中正上高会战经过概况》(1941年4月4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二阶段作战经过,档号:002-020300-00013-061。

②罗卓英《上高会战概述》,全国政协《闽浙赣抗战》编写组编《闽浙赣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226页。

③《蒋介石致熊斌卫立煌等密电稿》(3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028—1029页。

④《第十九集团军总部参谋处编上高会战概述》(1941年5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361页。

⑤《上高会战总检讨 军委会发表一周战况》,《中央日报》1941年4月11日,第2版。

⑥《锦江作战 自昭和16年3月15日至昭和16年4月2日》,527页,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C111110446600。

⑦第十九集团军《上高会战作战日记》(3月12日至4月9日),江西省上高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江西省上高县文化局编《抗日战争 上高会战史料选编》下集,第198页。

⑧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27页。

犯上高。罗卓英进而认为,日军发起上高会战的“两翼已折”<sup>①</sup>。尽管在北路日军撤退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持有不同观点,但无论第三十三师团北撤是遭国军之攻击被迫撤退,还是自认为完成作战计划而自主撤退,从客观的作战态势来讲,都符合国军摧折日军两翼的计划。

担任中路主攻任务的第三十四师团,明知南北两路不能按计划合击上高,依旧“迷梦未醒,孤军冒进”,攻陷高安后继续向上高西进,突入国军预设的第三线决战区域,迎战战力最强的国军第七十四军,而此时国军“袋口既张,囊底弥固”<sup>②</sup>。日方宣称的中路日军的高歌猛进,在中方看来,则是主动放弃高安,诱敌于第三阵线的决战地区。北路日军先行撤退,南路日军则受国军阻击而陷入苦战,中路日军孤军深入,战争胜利的天平已开始倒向国民政府。《中央日报》便以《赣北战局 我居主动》为标题发布军委会一周战况总结,“在寇方说,似乎进展甚速,但吾人判断,恐怕最近将来,败退亦必甚快也”<sup>③</sup>,这一判断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 (二)日军中路突进上高与国军的包围战歼敌

3月19日,日军北路第三十三师团已经开始撤退。20日,中路日军“窜抵上高附近”<sup>④</sup>,猛攻上高附近区域,与国军第七十四军展开激战。南路的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因遭到国军数次攻击,只能北渡锦江与中路日军会合,其分兵独立南进的赣江支队也遭到国军反击,难以推进。南路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与中路日军会合后,又欲向西南方向进攻石头街一带,以图进攻上高侧翼,与中路合击上高,却又与锦江南岸紧急回援的国军发生遭遇战,其目的未能得逞,便于24日返回高安。面对中路日军的猛攻,如上高阵地能够守住,国军则有时间调集北翼第七十军和南翼第四十九军实行包围。若上高阵地失陷,上高以西无阵地可守,日军可向东南迂回扫荡,其打击国民政府作战能力、掠夺物资之作战任务可大体完成。

上高保卫战进行得十分激烈。日军第三十四师团虽成孤军深入之势,但仍不肯撤退,继续猛攻上高。为达到“攻略上高之目的”,日军还利用空军优势,发动“陆空协同”作战<sup>⑤</sup>。日军第三飞行团长藤少将在致第三十四师团长贺大贺的信中称,“上高占领即在目前,请继续奋斗,以收赫赫战捷,不胜盼切”。在会战最为激烈之时,“敌仍在飞机三十余架轰炸下,集结最大兵力,向我下坡桥阵地猛犯,演成上高核心区最激烈之争夺战。是日一日间,全线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sup>⑥</sup>。《中央日报》转中央社电称,“十九日起全线复展开血战,敌机三十余架,战车二十余辆,不断轰炸猛冲,泗溪官桥石头街(上高西南)各地,失而复得者再,我将士浴血奋战,卒将进犯上高之敌击败”<sup>⑦</sup>。由于国军的奋战,日军始终不能攻克上高,面对日军的进攻,“我七四军均能确保阵地,以待合围态势之形成”<sup>⑧</sup>。

正是由于第七十四军在上高的坚守,为国军北翼第七十军和南翼第四十九军包围日军赢得了时间,同时第九战区派出第七十二军向上高以北地区挺进,进一步加强了左翼力量,将日军“压迫于南茶罗、官埠桥地区”<sup>⑨</sup>。最终,上高地区日军“不能击破我正面有力部队,反而投入我包围圈内”<sup>⑩</sup>。中央社电称,“我军对进犯上高之敌,于二十三日乘狂风暴雨敌机械化部队活动困难之际,对敌完成四面包围形势,截至本日(二十四日),我渐次缩小包围圈,展开伟大之歼灭战,迄午后三时,敌弹尽援绝,以飞机三十六架运送粮秣至敌阵中,企图苟延残喘,向我作最后

①《罗卓英电蒋中正第十九集团军上高会战情形》(1941年4月10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四十三),档号:002-090200-00067-014。

②《罗卓英电蒋中正第十九集团军上高会战情形》(1941年4月10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四十三),档号:002-090200-00067-014。

③《赣北战局 我居主动》,《中央日报》1941年3月21日,第2版。

④《贺耀组呈蒋中正上高会战经过概况》(1941年4月4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二阶段作战经过,档号:002-020300-00013-061。

⑤《罗卓英电蒋中正上高之战敌我伤亡及俘获及作战经验与心得》(1941年3月27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四十五),档号:002-090200-00069-137。

⑥《第十九集团军总部参谋处编上高会战概述》(1941年5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365、362页。

⑦《赣北展开大歼灭战 犯潮阳敌正包剿中》,《中央日报》1941年3月26日,第2版。

⑧《罗卓英电蒋中正上高之战敌我伤亡及俘获及作战经验与心得》(1941年3月27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四十五),档号:002-090200-00069-137。

⑨《王耀武电蒋中正上高会战伤亡人数与出力部队及赏恤等情形》(1941年4月10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二阶段作战经过,档号:002-020300-00013-062。

⑩《罗卓英电蒋中正自十五日敌进犯至二十八日我开始追击两周间上高会战概要》(1941年3月30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四十三),档号:002-090200-00069-140。

一逞,无如敌大势已去,乃图向东北突围溃窜,我正加紧围歼中”<sup>①</sup>。

### (三)国军围歼、追击与日军的突围、回撤

3月25日,日军第三十四师团见攻占上高已无可能,且意识到国军的包围圈已经开始收紧,于是向位于汉口的第十一军司令部求援,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急令第三飞行团协同第三十三师团向棠浦方向急进,以救援第三十四师团<sup>②</sup>。同时,第三十四师团开始向东北方向突围,在官桥附近的预备第九师(属第七十军)难以抵御日军两个师团的前后夹击,“遂陷苦战境地,前后交通通信均被截断,腹背受敌,而敌机之轰炸亦更加猛烈,伤亡至为惨重”<sup>③</sup>,于是北撤,致使敌突围军与增援军合流。27日,罗卓英决心“更澈底集中兵力对敌实施四面包围”<sup>④</sup>。尽管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回援,但国军依靠人数优势,并运用地形条件,灵活调兵,形成数次包围之势,使日军损失颇多。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称,“不时和顽强地尾随追击的敌人进行激战,展开全部兵力以求摆脱敌人。此间山炮队所有炮弹用尽,处于不能射击的状态”,“经过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重重苦难”<sup>⑤</sup>。日军各部会师之后,沿锦江东撤,国军展开追击作战,于4月1日“克复高安、祥符观,续向万寿宫追击”<sup>⑥</sup>。尽管国军战术运用得当,但中日双方军队素质差别依然存在,日军最终突围,于2日返回原驻军所在地。

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国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4月2日,罗卓英向蒋介石汇报称,上高战役“我军伤亡失踪人数,约两万余”<sup>⑦</sup>。4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致电蒋介石称,“我伤亡约万五千余”<sup>⑧</sup>。各方数据虽有差异,但可基本判定此役国军伤亡人数约1.5万至2万人。蒋介石在日记中亦提及,“赣北上高附近大捷,然我军伤亡甚重,不觉转乐为忧矣”<sup>⑨</sup>。此次会战为“抗战四年来仅有的对敌取得包围歼灭战有利态势”<sup>⑩</sup>。桂林行营办公厅所发的《上高会战经过与检讨》亦称:“此时我七十四军全军迎击于前,七十军尾击于后,四十九军(欠一师)侧击于右,七十二军围攻于左,战斗态势既形成于四面包围,而复以最优势之兵力,对此包围圈内后援已绝之敌一举而尽歼之,非力所未逮,不图于包围圈南北直径缩小至五公里之时,敌意突围逃窜,卒未能达到歼灭之目的,不无遗憾耳”<sup>⑪</sup>。

战争接近尾声之际,发生了一件颇为有趣之事,即各大报纸皆报道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的师团长贺茂已阵亡。如《申报》在3月31日便以“赣北大捷声中 日师团长阵亡”为标题进行报道<sup>⑫</sup>;《中央日报》更是在极醒目之位置,以“赣北捷报摧毁敌巢 敌酋大贺被我击毙”为题进行报道<sup>⑬</sup>。连蒋介石在其与各军事长官所发的电报中都称,“据虏获文件判断,大贺茂师团长在毕家村附近被击毙”<sup>⑭</sup>。4月3日,重庆方面的军委会发言人称,“据俘虏供称,

①《赣北展开大歼灭战 犯潮阳敌正包剿中》,《中央日报》1941年3月26日,第2版。

②I第5章 昭和16年に於ける作戦/第1節 錦江作戦J、206頁、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C13031744200。

③《陆军第七十军参加上高会战作战经过概要》(1941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380页。

④《罗卓英电蒋中正(续二)我各七十军五十一师七十四军等各部在上高之役战况及彻底集中兵力对敌围歼》(1941年3月27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四十五),档号:002-090200-00069-136。

⑤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28页。

⑥《贺耀组呈蒋中正上高会战经过概况》(1941年4月4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二阶段作战经过,档号:002-020300-00013-061。

⑦《罗卓英电蒋中正上高会战国军伤亡人数约两万余请调拨七个团开赣》(1941年4月2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二阶段作战经过,档号:002-020300-00013-059。

⑧《贺耀组呈蒋中正上高会战经过概况》(1941年4月4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二阶段作战经过,档号:002-020300-00013-061。按:贺耀组原名贺耀祖,早在国民革命时期,贺耀祖已将其名改为“耀组”。

⑨《蒋介石日记》,1941年3月29日,上星期反省录。

⑩罗卓英《上高会战概述》,全国政协《闽浙赣抗战》编写组编《闽浙赣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231页。

⑪桂林行营办公厅《上高会战经过与检讨》,江西省上高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江西省上高县文化局编《抗日战争 上高会战史料选编》上册,第12页。按:引文中漏一逗号,笔者引用时已补上。

⑫《赣北大捷声中 日师团长阵亡》,《申报》1941年3月31日,第3版。

⑬《赣北捷报摧毁敌巢 敌酋大贺被我击毙》,《中央日报》1941年3月29日,第2版。

⑭《蒋介石致熊斌卫立煌等密电稿》(1941年3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030页。

大贺师团长已阵亡”<sup>①</sup>。4月10日,罗卓英向蒋介石汇报上高会战情形时也指出,“毙敌大贺师团长”<sup>②</sup>。事实上,大贺茂并没有死,他的死亡信息是一种误传。不过,从上述史料可以判断大贺茂阵亡的消息出自日军文件或俘虏。而对国民政府来说,赣北大捷已经足以宣传庆祝了,没有必要为了吹嘘而专门编造一个可以被轻易戳破的谎言。日军方面,连师团长之生死都出现误判,可见日军当时之狼狈与混乱。

日军之伤亡惨重且未达到作战目的毋庸置疑,但日军之伤亡数字则是一笔糊涂账,中日双方无疑都会采取有利于己方的统计。日方称伤亡千余人,甚至称第三十三师团后期十分艰难的救援作战仅伤亡四百余人<sup>③</sup>,盖不足信。但国军方面的统计也不统一。日军出动人员大概四万两千余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所出综合战报称“敌伤亡约万人”<sup>④</sup>。然而,同为国民党官方编写的《上高会战经过概要》则记述,“敌三三师团主力被我击破,伤亡过半,第三四师团及独立第二十旅团被我歼灭十分之七”<sup>⑤</sup>。按此说法,日军伤亡必在半数以上,显然与之前的战报不符。报纸祝捷的文章则更为夸张,如称“被困之敌,除少数漏网外,余均解决”<sup>⑥</sup>、“卒将其各路兵力悉行歼灭”<sup>⑦</sup>,诸如此类的描述不一而足。在战争期间统计精确的伤亡数字固然不易,但夸大敌方之伤亡也是常有的现象。

总体而言,在上高会战的战斗中,国民政府方面化被动为主动,充分利用了日军战术配合上的失误,大胆由非决战正面抽兵,灵活调动兵力以形成包围之势,获得在战术运用上的成功。但两军战斗力的差距依然存在,国军在战术和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尚未能全歼日军。显然,当时中日两国国力与军力之差距不是可以随人的主观意志而迅速弭平的。即便是战术的成功与兵力的优势,也不能完成消除中日双方军队战斗力的差距,抗战之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 四 余论

上高会战是国民政府打得比较成功的一场战役,值得称赞和肯定。从日方宏观战略来看,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成果十分有限,故急欲谋划南进以打开新局面。日本有限的国力与膨胀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使其难以作出妥善的战略选择,故而其意欲在南进前通过一系列积极作战来解决“中国事变”,而上高会战正处于日军此次积极作战的时期。《大公报》社论指出,日军“企图打通各交通要线,巩固其侵占点线,使日本一旦南进,海军及大部运输舰转用于国际大冒险后,其深陷中国战场之百万大兵,不致全部僵化,更使我军无法乘机作有力反攻。前此东京扬言缩小战区,以及最近之高唱短期‘结束事变’,继以‘全面扫荡战’之发动,其企图即在此。但今年以来的几次战役,显然把这些企图都粉碎了!上高会战的大败,使它无法进行浙闽赣之大包围,以切断我后方及沿海区之交通”<sup>⑧</sup>。日军解决“中国事变”企图的失败,上高会战对此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对国民政府而言,其在正面战场上败多胜少,上高大捷让国民政府兴奋异常。国民党在八中全会宣读战报时,“全体中委,欢欣鼓舞,兴奋异常”<sup>⑨</sup>;蒋介石指出,“赣北上高附近大捷为一年来最大之胜利,敌自此更不敢深入”<sup>⑩</sup>;何应钦称,国军上高会战为“开战以来最有精采之作战”<sup>⑪</sup>;贺耀组也称,上高会战“为开战以来罕有之战

①《敌我军力消长 赣北之役已得明证》,《中央日报》1941年4月4日,第3版。

②《罗卓英电蒋中正第十九集团军上高会战情形》(1941年4月10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四十三),档案号:002-090200-00067-014。

③《第5章 昭和16年に於ける作戦/第1節 錦江作戦》,206页、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ファイル:陸軍一般史料、C13031744200。

④《贺耀组呈蒋中正上高会战经过概况》(1941年4月4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二阶段作战经过,档号:002-020300-00013-061。

⑤《上高会战经过概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512页。

⑥《八中全会始末纪》,《中央日报》1941年4月5日,第2版。

⑦《上高会战成果最大 影响今后作战指导》,《中央日报》1941年4月5日,第2版。

⑧《全面胜利》,《大公报》(香港版)1941年5月26日,第2版。

⑨《罗卓英将军对第七十四军高级官佐训词》,全国政协《闽浙赣抗战》编写组编《闽浙赣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243页。

⑩《蒋中正出席八中全会听取报告又亲临主持全体谈话会对于党务经济与粮食管理等问题均有指示并记本星期反省录上高附近大捷为一年来之最大胜利……》(1941年3月29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民国三十年三月,档号:002-060100-00150-029。

⑪《上高会战成果最大 影响今后作战指导》,《中央日报》1941年4月5日,第2版。

果”<sup>①</sup>；中央训练团特别党部称，“此次赣北大捷，关系整个抗战局势，至深且巨”，“新国际之视听，奠胜利之宏基”<sup>②</sup>；桂林《扫荡报》社论更是称上高会战对日军“南进打击至为重大”，“从此次赣北大捷，更树立了中国成为亚洲反侵略势力的中心地位，在倭寇南进的前途，划了一道悲惨的阴影”<sup>③</sup>。诸如此类的评价恐有拔高之嫌，但为胜利作舆论宣传则可以理解。毕竟，上高会战是一次成功的围歼战，这在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上是极为罕见的。对此作适当的宣传，对于鼓舞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有积极意义。不过，对于这种宣传，时人也持有不同意见。如桂林行营办公厅所出报告称，“综观本会战之战斗经过，以战略战术而言，我已有长足进步，惟视为空前大捷，不根据战斗之真正面目，而从事喧染殊为不当”<sup>④</sup>。可见，即使是国民政府内部，也有人认为对上高会战有宣传过度之嫌。

在上高会战中，民众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军民配合密切，这是上高会战得以胜利的重要保障。罗卓英指出，“民众用命，彻底破坏交通，使敌解除优势装备”，“后方勤务良好。兵站设施，年来以渐臻健全，兵站人员及地方民众，亦极努力”<sup>⑤</sup>。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上高县县长为中共地下党员黄贤度，且上高县也有中共的地下党支部。由中共党员部分掌控的上高县政府为会战做了大量工作，“上高县政府平时对民众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对于驻军，也曾利用军民杂居的条件，对官兵们进行爱国宣传”<sup>⑥</sup>。在县政府的积极动员下，有近三万民众被动员起来。上高会战中被动员的民众为战争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一，破坏敌军交通，阻碍日军行进步伐。在上高会战中，罗卓英致电蒋介石称，由于民众对日军“道路破坏，敌战车与炮兵不能大量使用”<sup>⑦</sup>。日军后方交通因受到破坏，使其“优势装备不能尽量发挥”<sup>⑧</sup>。罗卓英在《上高会战概述》中也指出，在会战中，“民众均能努力履行任务，尤以交通破坏，特见彻底。不但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运动，即驮马行走，亦感困难，致其追送补给，仅赖人力，当战斗达到顶点，被围困后，不得不以飞机运投粮弹鞋袜矣”<sup>⑨</sup>。其二，保障中方后勤补给，稳定后方。由于后勤人员和民众的支援，国军的后勤补给充足。国民政府事后总结，本会战于敌进犯时，对于派出之兵站各地弹药，“得全部抢救后运，无一损失”，而会战进行中及追击时，“补给复极圆滑，使部队得专心作战，此于会战胜利亦有功也”<sup>⑩</sup>。其三，敌后游击，协助作战。安义县城当时已经被日军占据，日军“调动频繁，增减无定”，安义县政府“乃把此时机，发动一切武力，民力，物力，乘隙以攻，以少克众，协助上高正规军，展我困敌扰敌歼敌之游击战，为时一月，奉命先后完成追占滩溪，攻克峽峻，袭入县城之主要任务，并不断破坏敌之交通，袭扰敌之据点，加强经济封锁与抢运陷区资物等工作，使敌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受我牵制，企图动摇”<sup>⑪</sup>，有力地策应了在上高作战的正规军。民众动员颇见成效，归根结底是日军之侵略暴行点燃了中国人民的怒火，这是全民抗战浪潮中所爆发出的人民伟力。

上高会战后的抗战走向才是时代的关键问题，毕竟一场局部胜利不能改变大局。无论是报纸，还是国民政府的军事报告，皆称国军越战越强。何应钦在采访中讲：“全军得此捷报。非常兴奋，而各级指挥官更将因此而增大其旺盛之战斗意志，故判定我军今后之作战行动，亦将因此而愈形活跃也。”<sup>⑫</sup>据《王子壮日记》记载，蒋介石在1941年3月31日总理纪念周上讲道：“在军事方面，由最近鄂西赣北之捷，可证明我军事布置之进步，敌人完全依

①《贺耀组呈蒋中正上高会战经过概况》(1941年4月4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第二期第二阶段作战经过，档号：002-020300-00013-061。

②《电贺赣北大捷》，《中央训练团团刊》1941年第71期，第565页。

③《赣北大捷所予倭寇南进的打击》，江西省上高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江西省上高县文化局编《抗日战争 上高会战史料选编》上集，第162页。

④桂林行营办公厅《上高会战经过与检讨》，江西省上高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江西省上高县文化局编《抗日战争 上高会战史料选编》上集，第12页。

⑤罗卓英《上高会战概述》，全国政协《闽浙赣抗战》编写组编《闽浙赣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239、240页。

⑥王道平《长留浩气满乾坤》，全国政协《闽浙赣抗战》编写组编《闽浙赣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295页。

⑦《罗卓英电蒋中正上高之战敌我伤亡及俘获及作战经验与心得》(1941年3月27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四十五)，档号：002-090200-00069-137。

⑧《罗卓英电蒋中正自十五日敌进犯至二十八日我开始追击两周间上高会战概要》(1941年3月30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八年血债(四十三)，档号：002-090200-00069-140。

⑨罗卓英《上高会战概述》，全国政协《闽浙赣抗战》编写组编《闽浙赣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239页。

⑩《第十九集团军总部参谋处编上高会战概述》(1941年5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三)，第373页。

⑪郑擢《上高会战中安义之游击战》，《县讯》1941年6月15日第12期，第16版。

⑫《上高会战成果最大 影响今后作战指导》，《中央日报》1941年4月5日，第2版。

我之决定在预定之决战地点予以歼灭之打击,致敌二师团之兵力损失在一半以上,如果敌人无战车等重武器,必将予以全部消灭。由此以观,军事方面以后决无问题。”<sup>①</sup>他们对以后的军事问题颇为自信,然而国民党军队在同年5月的中条山会战大败,“抗战以来最有精采的作战”之后仅一个月,便迎来了“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蒋介石在日记中称“晋南中条山阵地失陷”,“为从来所未有”<sup>②</sup>,“军事方面以后决无问题”遂成为空谈。国民政府军事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与缺陷,并不是一场局部大捷就可以改变的。而日军抱有重望的夏秋时期所发动的攻势(主要指中条山战役和第二次长沙会战),也不能使国民政府屈服,其在1941年解决“中国事变”的战略企图遂完全失败。野心膨胀的日本于1941年底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无限膨胀的野心最终使日本军国主义走向灭亡。

全面抗战时期,尤其是中日进入相持阶段后,正是这样一场场看似不影响总体战局的中小型战役,构筑起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抗战支柱,这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上高会战正是其中之代表。战役中所表现的伟大抗战精神,不会因其在总体战略的地位是否重要而有高下之分;上高会战中英勇奋战牺牲的将士与支前民众,永垂不朽!

## Strategic and Tactical Gam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Armies in the Battle of Shanggao

He Huaikai, An Q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 Battle of Shanggao in 1941 was the sweeping battle launched by the Japanese army with the goal of attacking the combat capabilities of the 19th Group Army and plundering materials. However, Japan was strategically unstable and in a state of self-contradiction. In terms of tactics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various troops also failed to cooperate effectively, ultimately falling into the encirclement of the national army and causing heavy losses. Before the wa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a relatively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Japanese army's possible strategy of advancing southward. At the same time, the Ninth Theater Command also had a high degree of vigilance and clear judgment on the possibility of Japanese attacks in the Shanggao and Gao'an regions, and had made a series of pre-war preparations. During wartime, the generals of the national army commanded properly at all stages, were able to take the initiative, and the army was able to complete established tasks according to the combat plan. Under the appropriate arrange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is anti-sweeping war evolved into a quite successful encirclement and annihilation battle, and the Shanggao victory was hailed as the “most wonderful battl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In short, the Battle of Shanggao, as a representative of medium-sized battles during the counter-Japanese war, has certain research value.

**Key words:** medium scale battles in counter-Japanese war; Battle of Shanggao in 1941; Chinese and Japanese armies; strategic and tactical game

[责任编辑:凌兴珍]

<sup>①</sup>王子壮《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7册(民国三十——三十一年),1941年3月3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编印,第90页。

<sup>②</sup>《蒋介石日记》,1941年5月31日,本月反省录。